《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00期（2026）：1–39

傳播論壇

重返實踐論：一個傳播學史的分析——兼答肖小穗教授

張晨昊[a]、杜駿飛[b]

[a]南京郵電大學智能傳播研究院，南京市，中國大陸

[b]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南京市，中國大陸

摘要

傳播學的理論困境，既來自流動的實踐性，也來自受限的思想力。從學科淵源來看，傳播學的信息論隱喻日趨枯竭，也日漸脫離了人類數字交往的實踐；「語言論轉向」為傳播學貢獻了哲學基礎和諸多理論，但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畢竟，「生存經驗大於語言」，我們既不能以工具分析取代本體論，也不能以「走出二元」的教條來限制傳播學的想像力；「實踐轉向」思潮作為語言論的自然延伸，其本質仍是抽象的語言辨析而非生動的實踐性。為此，本文呼喚重返「實踐論」哲學的學術立場，即：在更古典、更寬廣、更接地的實踐哲學指引下，

張晨昊（共同第一作者），南京郵電大學智能傳播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研究興趣：傳播思想史、傳播理論、新聞史論。電郵：1446103201@qq.com

杜駿飛（共同第一作者，通訊作者*），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研究興趣：互聯網傳播、傳播哲學、新聞理論。電郵：dujunfei@vip.sina.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6年3月2日。論文接受日期：2026年4月3日。

重置傳播的定義域，尋求傳播學的再次養成。這意味着傳播學要回到亞里士多德，承認倫理與政治的決定性、追求人的幸福和最好的公共性；這也意味着傳播學要回到馬克思，重視「感性的人」，承認實踐的本體性。本文認為，基於當下「數字交往」的交流－行動特質，一種面向未來的傳播學應從更高維度重審人類交往，將傳播之學理解為實踐主義的「交往研究」，通過「傳播」的再概念化和再問題化，尋求重新發現理論的可能。本文亦作為對肖小穗教授於《傳播與社會學刊》第71期所刊登的〈數字交往還是符號互動？兼與杜駿飛教授商榷〉（2025）一文的回應。

關鍵詞：信息論、語言論轉向、實踐轉向、實踐論、交往研究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00* (2026), 1–39

Communication Forum

Return to the Theory of Practic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A Response to Professor Xiao Xiaosui

Chenhao ZHANG [a], Junfei DU [b]

[a] Institute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Mainland China

[b]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Mainland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tems from both its fluid practicality and constrained intellectual 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origins, the information theory metaphor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epleted, gradually detaching itself from the practice of human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 "linguistic turn" has endow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with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a wealth of

Chenhao ZHANG (Special Appointed Researcher, Co-first Author). Institute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terests: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thought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history and theory of journalism. Email: 1446103201@qq.com

Junfei DU (Professor, Co-first Author,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internet 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theories. Email: dujunfei@vip.sina.com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on 2 March 2026. Accepted on 3 April 2026.

theories, yet it bears inherent limitations. After all, "lived experience transcends language." We can neither substitute instrumental analysis for ontology nor restrict the intellectual imagin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with the dogma of "transcending dualism." As a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trend of the "practical turn" is, in essence, still abstract linguistic discrimination rather than vivi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response, this paper advocates a return to the academic stance of the "theory of practice"—that is, to redefine the scope of communication and seek the reconstitu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more classical, expansive, and grounded practical philosophy. This entails returning to Aristotle, acknowledg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ethics and politics, and pursuing human well-being and the optimal form of publicity. It also means returning to Marx, emphasizing the "sensuous human being" and affirming the ontological nature of practice. This paper holds that, given the communicative-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digital association," future-orient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ould re-examine human interaction from a higher dimension and conceptualize the discipline of communication as a practicalist "study of association." Through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re-problem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it endeavors to rediscover the potential of theory. This paper also serves as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Xiao Xiaosui's "Digital association or symbolic interaction? A discussion with Prof. Du Junfei," published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Issue 71 (2025).

Keywords: information theory, linguistic turn, practice turn, theory of practice, association studies

我們認為，學者以學術為志業，而非以學科。相較於以學科為本位，一個生機勃勃的學術界更應以學術發展為本位。實際上，關心學術勝過關心學科，才可能發展學科，關心學科勝過關心學術，既得不到學術也得不到學科。並且，一門人文社會學科，只有在關心人、關懷生命、關注實踐的時候，它才具有真正重要的學術影響力。

多年來，傳播學界時有學科中落的嘆息，及至對學科「本色失守」(肖小穗，2025)的焦慮。我們希望，這些憂懼的出發點，是要衝破理論封印、建立更高認知，而不是為了學科邊界而故步自封，也不是坐對學科利益而患得患失。十年前，杜駿飛與周玉黍(2014)曾撰文分析過「傳播學科的身份危機、範式危機以及理論危機」，既是要籲請「學科的解放」，也是要對人類社會的交往變革形成更深切的認識。

今天，當我們再次以「理論困境」描述傳播學在新數字時代的遭際時，仍是要批評它：或是未能及時就新實踐提出新問題，以至於理論缺少預見性、前瞻性；或是未能就老問題做出新回答，以至於理論缺少原創性、解釋性；又或是未能與其他學科充分對話，以至於理論缺少開放性、包容性。

同時，我們也認為：學術當隨時代——從數字前沿實踐的視角看，傳播學必須邁向一種思想變革，從信息論、語言論重返實踐論。以人類思想史和傳播學術史的脈絡來看，重返實踐論意味着，必須正視學科的缺陷，才能根治其痼疾，贏得真正的學術自尊。說得直接一點：數字交往時代是一次新的歷史機遇，我們有望重置傳播的定義域，以彌補學術範式的先天不足，並尋求學科的再次養成。

鑑於本文與杜駿飛於《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9期刊登的前文〈數字交往的觀念〉(2024)，以下或簡稱「杜文」，及肖小穗教授於第71期的前文〈數字交往還是符號互動？兼與杜駿飛教授商榷〉(2025)，以下或簡稱「肖文」，理論關懷相近，同樣涉及到對傳播學信息論及語言論範式的理解、對數字交往本質的認識，以及對傳播學未來發展的分析，因此，我們亦將本文作為對肖文的間接回應，並以此求教於肖小穗教授及讀者。

一、信息論的衰微

五年前，巴西學者威廉．弗盧塞爾（Vilém Flusser）在中國尚寂寂無名。2020年起，他和他的傳播學（Kommunikologie）被「重新發現」，並在此間風行，四年間竟有六部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他的學說也被寫進了傳播學教科書。對此，弗氏本人未必欣慰，他曾言：「執意要將傳播理論和信息學中的考察說成是對同一事物進行的考察是沒有意義的」（弗盧塞爾，2022：6），而他所譏刺的「信息學」，卻從來就是傳播學教科書中的主流。

實際上，這正是傳播學最為醒目的裂痕。一門學科的學科性質，來自其作為整體所表現出的內在規定性，這種規定性，是通過其知識系統、研究對象和治學方法體現出來的。在第一位追問傳播學學科性質的學者貝雷爾森（Bernard Berelson）看來，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心理學、進步主義、新聞學、語言－心理學、歷史學、精神病理學和通信科學等十個領域都是傳播學的一部分（Berelson, 1959）。近七十年過去了，我們這個學術共同體關於傳播學的想像，仍然不具有整體性。要麼是無政府式的「群雄並起」，例如克雷格（Robert T. Craig）所謂的傳播學七大領域（Craig, 1999）；要麼是壟斷－競爭的「一超多強」，例如胡翼青（2022）所述之「傳播研究版圖的三國演義」。

以科學史家庫恩（Thomas S. Kuhn）（2022）和他的同事勞丹（Larry Laudan）（1990）之見，一門增長中的學科/科學——當然也包括傳播學，理應是一個擁有自身歷史的，由概念、理論、實踐、方法不斷生成締結的系統，這個系統被庫恩稱為「範式」。只有在確立了一種範式之後，才稱得上是一門成熟的學科。那麼，傳播學有範式嗎？當然也有——例如從學科演化史來看不算成功的「信息論範式」。

傳播學長期維持一種非牛頓流體式的學科形態，這恰恰緣自信息論範式的過早確立。信息論傳播學初現於1920年代的帕克（Robert E. Park）和布魯默（Herbert Blumer），並不落後於社會學、心理學等現代社會科學。自此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信息論範式主導了傳播研究：其於1940年代受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和霍夫蘭（Carl I. Hovland）加持，因1950年代流行的香農（Claude Shannon）和維納

(Norbert Wiener) 的信息論學說而得名，最終在1960年代成型於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這種學科範式的早熟與主流化，其後果是利弊互見的。首先，長期充當傳播學知識論樞紐的「信息」(information) 概念，很是符合傳播學的「科學」身份認同；其次，香農信息論取得的實績，即通過「增加冗餘」而非「改造信道」的方法，完美解決了通信系統中的「噪音難題」，這無疑是對信息傳遞可度量性和傳播效果可預測性做出的承諾。種種原因，導致「一般通信系統」模式成為有關傳播現象的共識，廣而言之，信息論範式長期主導傳播學研究，也得益於它曾以科學化為旗幟，復以大眾傳播效果為核心命題。這一度是傳播學同其他社會科學對話的依憑，甚至還是施拉姆指認傳播學奠基人的「唯一標準」(胡翼青，2007)。

的確，信息論範式曾在宣傳、民意調查、說服等現代性議題上取得過高信度的成果，但在近五十年間，面對新的科學觀念、新的思想運動和新的社會現實，耽於短期功利的傳播學逐漸失掉了解釋實踐前沿的優勢，也錯過了與其他學科共同演化的機會。究其本質，還是因為「信息論範式」過度倚仗「信息」隱喻，而那種脫離了全景實踐母體的「信息」，對於人類交流來說，實則是一種被有意窄化的表徵。

隨着社會媒介化的進程不斷加深，傳播學信息論範式愈發暮氣沉沉。其理論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內捲化 (involution)，沉湎於本學科半個世紀前的理論成果而創新乏力；二是學術邊緣化，屢敗於其他學科對新傳播議題的話語爭奪。想想看，1980年代以來，後現代時期理論更迭頻仍，數字交往實踐變革加劇，身體、情感、物質、知識、媒介等重大問題，不見重於傳播學，倒是在哲學、社會學、心理學、藝術學等領域煥發了更大的生命力。在大多數時間裏，傳播學主流抱緊信息論範式而煢煢孑立，它似乎仍在執拗地考察着「信息流動」，但時間卻已凝滯，理論也不再長青。

祝建華 (2012：1) 觀察到，「進入90年代以後，就如成年人一樣，傳播學少了驚喜，多了穩定和多元」，李金銓 (2019：92) 則將這一現象重新表述為「內捲化」。近年來，傳播學不停地轉向身體、情感、物質、知識、媒介，其本質即是在信息論範式的貧困中尋求語言論的託庇。

彼得斯（John D. Peters）（1986）曾慨嘆：「信息論的遭遇是一個教訓，它說明在傳播學學科形成的早期，為了爭奪學科地盤，學術和理論嚴謹性如何被犧牲了。」我們的理解是：那被犧牲掉的代價，是本應更有生機、更有生物性的學術體系，是更為深廣宏富的可能性。

今天，我們無法確證施拉姆是否真正理解了信息論或控制論（杜駿飛，2002；羅傑斯，2012；Schramm & Porter, 1982）；而當年，他卻的確僅憑對信息隱喻的篤信，不無莽撞地提出過一個具有本體論色彩的命題：「人是信息處理的動物」（Schramm & Porter, 1982, p. 39），自此，一種傳播實踐如果不能在認識論上被還原為某種信息流，那麼，它在信息論範式內部就不能得到討論。易言之，對信息論傳播學而言，那些無法被恰當還原為信息流的「身體」、「情感」、「知識」、「形式」等人類活動要素就只好被棄若敝屣；至於「心靈」、「時間」、「道德」、「團結」、「治理」、「公共性」、「生存」、「生命」等更高維度的人類實踐命題則更是無從談起。

假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之口，對信息論範式這一段理論歧途最恰當的定性是「實體之夜」——「再無一處可想像之處，便是數據處理之所」，而早在 1945 年唯一一台電子計算機運行之際，也即信息論萌生之際，「夜之黑的最初輪廓就已浮現。」（基特勒，2019：2–4）

對於佔據傳播學主流數十年之久的信息論思想邏輯，我們的態度是：承認自己的學科出身並不意味着要永遠引以為榮，更不意味着無論遇到何種時代變革都要自始至終地「原教旨」下去。恕我們直言——信息論範式的傳播學，其未老先衰的命運，自它出生時便已注定。

二、語言論的價值

與信息論範式相比，語言論的範式之名至今在傳播學術史的討論中隱而不彰，作為其學術背景的「語言論轉向」在傳播學術共同體內部也還相當陌生。而就學術氣候來看，也許，是時候為其正名了。

語言論轉向（linguistic turn，也稱「語言轉向」或「語言學轉向」）通常被定位為哲學史上繼「認識論轉向」（epistemological turn）之後的又一次變革。徐友漁（1994：5–6）高度凝練地表述了二者的基本內涵，即認

識論轉向「使哲學的基礎從本體論和形而上學變為認識論，從研究超驗的存在物轉到研究認識的主體和主客體關係」；而語言論轉向「把對主客體的關係研究變成了對主體間的交流和傳達問題的研究，把對主體研究從心理學領域轉移到了語言的領域」。

作為一種指代，語言論轉向主要在三重歷史維度上被使用：(1) 在思想史上，語言論轉向是指，始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理性至上」意識形態所引發的人與物、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緊張關係的全面檢討；(2) 在哲學史上，語言論轉向是指，20世紀20至30年代以分析哲學為代表的英美語言哲學及以海德格爾哲學為代表的歐陸現象學－解釋學的發生；(3) 在學術史上，語言論轉向是指，1960年代席捲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思潮，其主要體現是遍及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學、符號學、文學、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等領域的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建構主義社會觀和結構主義方法論。歸結起來，(2) 和 (3) 都是 (1) 在具體學門中的投射。

哲學史上的語言論轉向，始於兩種不同的傳統：(1) 英美哲學認為，語言居於主體與世界之間，構成「主體－語言－世界」的認知序列，語言是主體認識世界的工具，若要就認識論發問，須得構造一種人工語言， 維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的《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1963) 和因它而起的邏輯實證主義均持此說；(2) 歐陸哲學，特別是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的存在主義哲學堅信語言關乎「存在」，立意分析人類實踐中的自然語言。二者大抵沿着科學的和人文的兩條不同路徑，先後滲透進包括傳播學在內的20世紀學科群。

在20世紀前半葉，以數理邏輯和「理想語言」為特徵、以維特根斯坦和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哲學為代表的科學的語言論轉向領風氣之先。這是語言論轉向影響傳播學的第一條路徑，體現了邏輯實證主義 (logical positivism) 的影響力。它的首倡者是被稱作「維也納學派」的科學家小組，其核心是普朗克大師的弟子、出身物理學的維也納大學哲學教授石里克 (Moritz Schlick)，傳播學的奠基人拉扎斯菲爾德是這個圈子的外圍成員。作為一種「科學的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它擯棄離奇的思想結構，神秘的直覺作用，以及所有感情上的信念，而代之以嚴密的邏輯推論，精細的實際觀察，以

及事實上的證據」（洪謙，2022：58）。待到拉扎斯菲爾德於1935年去歐赴美後，「實用主義與實證主義在傳播研究上的合流便水到渠成」（李耘耕、胡翼青，2015：5、12）。

語言論轉向影響傳播學的第二條路徑是文學理論。轉向語言論標誌着現代文論走向興盛，「隨着語言取代理性，主體漸漸淡出，對文學的詞語、形式、結構的考慮在文論中漸漸獲得了優先地位，甚至取代了對情感、思想、意義的考慮」（王一川，2009：98）。俄國形式主義是現代文論語言論轉向的第一項實績，在1920年代曇花一現，其代表人物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語言傳播六要素」模式被傳播學評價為具有區別於「一般通信系統」模式並能與之對話的雙重性（Cobley, 2010; Fiske, 1990）。同一時間，英國劍橋大學的理查茲（Ivor A. Richards）和利維斯（F. R. Leavis）等學者發展出了現代英語學界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文論流派——新批評（New Criticism），他們的學生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分別開闢了傳播學的文化理論和媒介理論。

語言論轉向作用於傳播學的第三條路徑，是波蘭裔美籍學者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在1930年代發展出的普通語義學（general semantics, GS）。麥克盧漢對普通語義學讚譽有加，認為它標誌着一種新型的思維和推理方法，折射出與電子技術有關、與以計算機為基礎的數字技術有關的新型媒介環境（McLuhan, 2006, p. 17）。正因如此，「許多傳播學者同意，將普通語義學的一些精粹納入傳播學的架構，是適宜的」（張國良，2003：247）。

語言論轉向的演進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中止。但，戰爭對人類心靈和生活世界造成的創傷，強烈地否定了「理性至上」的意識形態，這對語言論轉向來說，反而成為一種逼促。在這一背景下，語言論轉向在戰後強勢回歸，其標誌是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的出版和海德格爾語言哲學的成熟。這一時期，海德格爾提出「語言是存在之家」的命題，顛覆了科學的語言論轉向「主體－語言－世界」的認知秩序，形成了「語言（主體－世界）」的新闡釋；與此同時，維特根斯坦一改往日對人工語言的憧憬，投身自然語言，從關注語言邏輯轉而關注語言應用。於是，兩者合流（強以華，2018；

娜豐，2019），匯入語言論轉向的人文路徑，共同成為未來「實踐轉向」的思想淵源。

1960年代，「語言論轉向」這個標誌性術語姍姍來遲。在影響廣遠的同題論文集中，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聲明了這一修辭的含義：「通過改革語言，或通過進一步理解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言，可以解決甚至排除哲學上的種種問題。」（Rorty, 1967, p. 3）自此，語言論轉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學術沉澱，融入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總體，通過不同的思想主題如「文化」、「話語」、「知識」、「神話」、「中介」等出場，化身為歷史觀上的「後現代主義」、社會觀上的「建構主義」、方法論上的「結構主義」，繼續參與包括實踐轉向在內的人類知識生產。

這一時期，傳播學語言論範式也開始出場。與伯格曼提出「語言論轉向」概念同一年，麥克盧漢出版了名著《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1964），成為傳播學術史乃至整個傳播思想史上的大事件。在施拉姆、羅傑斯一脈的主流敘事堅持將「技術決定論」的標籤貼在他身上時，詹姆斯．凱瑞（James W. Carey）的弟子切特羅姆（Daniel J. Czitrom）已然指出，麥克盧漢的影響「應當被放到更廣泛的對於語言、傳播、神話及一切類型的表達形式的共時分析這一趨勢的背景中去」（1991：196–197）。然而，傳播學術共同體對麥克盧漢神啟般箴言的興趣，顯然勝過了從他的靈感庫中剝離出語言論的衝動。實際上，麥氏在思想上同利維斯和柯日布斯基這些早先轉向語言論的前輩很親近，他同樣接受了美國語言學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斯特拉特，2016）。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在故去前一年，麥氏在人生最後的主題報告中明言：「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人的一切延伸都是我們存在的外在表達或外化，都具有語言的性質」、「我恍然大悟，技術實際上都是語言性質的結構」（麥克盧漢，2023：276）。這是麥氏對自己經典命題的自我解說，「語言」在這裏取代了「媒介」。或許，我們可以將他這一學術遺命轉譯為：人的延伸即媒介，而媒介即語言。

麥克盧漢以後，遍地生花的媒介研究或多或少都與語言論轉向相關聯。其中，波斯曼（Neil Postman）的媒介環境學和彼得斯的媒介哲學尤為典型。

1970年代，英美文化研究成為傳播學語言論範式中第二大流派。在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領導下，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進一步接受自法國舶來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和後結構主義，對媒體文化展開研究。霍爾曾回憶說：「那種讓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整個英國文化研究——的穩固道路發生移位和去中心化的東西，就是有時被稱為『語言論轉向』的東西，即發現了話語性和文本性。」（Hall, 1992, p. 283）幾乎同一時間，詹姆斯．凱瑞在美國獨立發展出了文化研究，有時也被稱作「伊利諾伊學派」。他更多取法海德格爾的語言存在論（Grossberg, 2006），在論文集《作為文化的傳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中聲明「語言即傳播」，並稱它「是一種行為方式——或更準確地說，是一種互動——它不僅僅是再現或描述，事實上它是對世界的形塑與建構」（凱瑞，2019：77）。

正當英美文化研究如火如荼之際，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也在醞釀批判理論的「語言論轉向」，最終產出溝通行動理論。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諾（Theodor Adorno）一代法蘭克福學者那裏，批判理論就表現出對語言論的興趣，這是哈貝馬斯轉向語言論不應忽視的理論根底（汪堯翀，2023）。

除美、英、德等國外，在法國這個結構主義大本營，其傳播學本就脫胎於語言論轉向，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和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都對大眾傳播抱有濃厚興趣。在中國傳播學界，得益於「麥克盧漢研究熱」和對海德格爾哲學的發現，彼得斯的傳播哲學、德國媒介技術哲學特別是基特勒的媒介本體論、德布雷的媒介學、媒介化理論等紛紛得到引介（吳志遠、杜駿飛，2016；胡翼青，2016；周好雨、胡翼青，2023），近幾年更是發展出了獨具一格的傳播研究「知識轉向」和「媒介轉向」（劉海龍，2020；黃旦，2024）。

當然，在完整的傳播學語言論範式譜系中，列名者還應有：作為「先驅之先驅」的人類學－語言學家薩丕爾（Edward Sapir）、象徵性互動論的提出者米德（George H. Mead）、非言語傳播的宗師伯德惠斯特爾（Ray Birdwhistell）、修辭學名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以及受惠於他們的社會學巨擘戈夫曼（Erving Goffman），如此等等。實際上，肖文所珍視的符號互動論，以及時下煊赫的傳播學理論，如弗盧塞爾的

「媒介現象學」，及至諸種流行一時的傳播學轉向，都可以劃入語言論範式和語言論轉向（甚至，其中的一部分已被冠名為「實踐轉向」）。

我們的意見是，這些理論承繼和分享了語言論轉向近百年來的思想精粹，成就可敬。但，它們同樣也面臨語言論自身的問題。肖文曾追問：實踐的數字交往論究竟是傳播學的解放還是終結？實際上，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藏在題面之中。想想看，語言論傳播學本就是對信息論範式的一場學術革命，不是嗎？

那建造家園的，也建造藩籬。那去除邊界的，也去除監禁。

三、範式的藩籬

為傳播學的語言論範式正名、同時亦討論其局限性，這兩者同等重要。

首先，最容易觀察到的是，語言論範式緩解了傳播學理論焦慮，卻自陷於方法論困局，因為其實績往往高度依賴研究者的天才般的直覺和有說服力的修辭。前些年流行一時的彼得斯，在媒介所能抵達的「六重宇宙」（神祇、凡人、動物、天空、地球、海洋）內，將海德格爾哲學發揮得淋漓盡致，卻不得不尷尬面對同行好友對其「精神狀況」的關心（彼得斯，2020：4）。眼下名氣正旺的弗盧塞爾學說同樣逃不脫這一命運，「因為缺乏嚴格的程序，這種充滿人文色彩的姿態分析變成了像精神分析一樣的魔法，但在高明的魔法師筆下，姿態分析可以大放異彩」、「我們也可以設想，在一個缺乏敏銳洞察力的分析者那裏，姿態分析也可能成為陳辭濫調或不着邊際的胡扯」（劉海龍，2024：8）。

這一短板與語言論轉向在其他學術領域所表現出的並無二致。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就直言：在文學理論界，「那些有能之輩，構想出女權主義、結構主義；那些無能之輩，則將這些深刻見解運用於《白鯨記》或《帽中貓》，但是新的一代未能拿出可與前輩們比肩的觀點」（伊格爾頓，2021：4）。科學哲學家邦格（Mario Bunge）（2024：188）更是厭棄海德格爾哲學，認為它是「一堆胡扯、舛誤和陳詞濫調」，並聲稱「我敢說沒有人有膽量使這些文字遊戲說得通，甚或把它們翻譯成好的德語」。此等辯駁固然有過激之嫌，但仔細想來，那些關於海德格爾的

「過飽和」的學術跟風、那些「塑料的」而非有機的學術附會，確實有些令人生疑——時下，理論販運界對所謂人神天地、在世存有、座架被拋、上手在手等概念的挪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心領神會和精神對話，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吠影吠聲和人云亦云呢？

其次，我們也注意到，傳播學語言論範式在為信息隱喻祛魅時，自身也將核心概念隱喻化，「語言」及其衍生出的「文化」、「媒介」、「技術」等概念紛紛化身「空洞的能指」。比如媒介概念的出場，本是擺脱渠道工具論的重要理論突破，但其涵義在短短幾年間已嚴重「通脹」。于成（2022：4）就呼籲：「我們需要警惕這樣的誘惑：打着『萬物皆媒』的旗號，視媒介為形而上學的接班人，將它規定為把所有存在者聯繫起來的最高概念，從而切斷存在者與存在本身的聯繫。『萬物皆媒』的後果是，人們完全可以撇開最高概念而走向各種特殊的存在者，由各種現實的媒介填滿作為最高概念的媒介的空洞。」

人文社會學科本應更為嚴肅地對待概念，不是嗎？曾經，一陣「操作主義」（operationalism）之風捲過心理學、社會學等學術場，它否定或迴避概念之於研究的價值，主張以操作對象來代替定義概念，藉以免遭抽象術語可能帶來的麻煩。芝加哥社會學者貝克爾（Howard S. Becker）曾語帶譏刺地評價操作主義者：「雖然他們無法定義態度，但這阻止不了他們發明測量態度的方法。通過某個程序，人們回答一長串問題最後得到一個數字，這個數字『測出了』人們對於電影、外國人、學校或政黨的態度。」（貝克爾，2017：131）

語言論範式的趨向與操作主義者相反，卻同樣極端，它並不在意其所提供的概念能否成為學術「通貨」。早有學者關注到，在語言論轉向中，語言「實際上是語言符號、非語言符號及現代傳播媒介的總稱，也就是指人類的符號表達方式」，而「不同論者在實際使用時，往往會有不同的側重」。（王一川，1994：49）對此，卡西爾（Ernst Cassirer）（2013：186）的批評可謂一語中的：「語言就其本性和本質而言，是隱喻式的；它不能直接描述事物，而是求助於間接的描述方式，求助於含混而多歧義的語詞。」或許，這也就是操作主義者對概念敬而遠之的根源吧，畢竟，一旦解釋清楚，文化的神秘感也就失去了。

再次，通過語言及其化身，傳播學本有望走出主體主義哲學的二元論桎梏，它提供了兩套可行的替代方案，三元論的「主體－語言－世界」和一元論的「語言（主體－世界）」；然而，語言論及其所依仗的建構主義和後現代學說都還不夠可靠。對此，發生在1990年代中期，試圖揭露後現代主義將科學知識「語言遊戲化」的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事件就是明證，[1]其本身折射出20世紀末學術界的兩大危機：科學權威的祛魅與批判理論的自我消解。

表面上看，建構主義和後現代哲學的癥結在於，「『後現代知識』不得不承擔相對主義之邏輯悖論：『不存在真理』本身實際上自居真理（而不是敘事性知識）」（吳冠軍，2023：435）。但這種相對主義所造成的後果，事實上具有更沉重的自反性：由於對真實性判據構成巨大衝擊，它使「人文精神失去了真實基礎」，繼而「哲學再也不能承擔起重建人文精神的任務」（金觀濤，2022：9）；最終，在後現代思潮潰退後，人類只得孤單面對知識經濟以來工具理性壓過人文理性的現實；而這種明顯失衡的人類精神處境，就是思想界在近幾十年間轉向實踐理性的驅動力之一。（杜駿飛，2023：17）

也因此，語言論提出－解答問題的能力實際上飽受質疑。語言論轉向的本質，是哲學在退出本體論也即認識論轉向之後的再次後撤，標誌着人類智慧在理性問題上的潰敗：既然無法做出好的回答，就只得把精力投入對作為認識手段的語言的考察（徐友漁，1994；強以華，2018）。當然，也不乏將語言論轉向納入認識論範疇的學者，例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只是，連他自己也滿懷疑慮：「對認識論問題的關注或許的確有它的重大意義，但這會轉移我們的注意力，忽略社會理論更為『本體性』的關懷」（吉登斯，2016：8）；又如金觀濤（2022：15），他對這一「半途而廢的認識論革命」強烈不滿，認為：「新的哲學應該再一次論證終極關懷和人文世界的意義，指出其真實性並非科學真實所能取代，然而它不僅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廢除了哲學的功能。」

傳播學語言論範式的實際表現也是如此。以麥克盧漢為例，他於1964年推出《理解媒介》後曾立志把自己的學說發展為一套媒介定律

（media law），以示其超然於特定時空下的媒介實踐，是一種「人的科學」(McLuhan, 1964)。那時，麥氏及其追隨者對此懷有無限自信。然而，僅過十年，《理解媒介》就被看作是「他最不重要最過時了的著作」（切特羅姆，1991：190），他本人也「不再是流行文化的名家」(Schramm & Porter, 1982, p. 115)。至少在他本人去世前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其學說不再被認為能夠詮釋媒介實踐。有學者評價稱：「他的種種想法就像是在極力主張一種『打哪兒指哪兒』的『事後諸葛亮』」（霍洛克斯，2005：37），更有甚者，有人還調侃他所發明的冷熱媒介等概念，戲稱：「播放電影的電視是『溫媒介』。」（斯帕克斯，2013：212）

最後，我們還應該提及詹姆斯．凱瑞——他在傳播思想史上最先聲明：「傳播是一整套社會實踐，它以概念、表達方式和社會關係為切入口。這些實踐建構了現實（或是否定、改造了現實，或是用儀式展現了現實）」（凱瑞，2019：77），由此發展而來的儀式傳播觀名噪一時。然而，同樣有學者對他的學說提出批判，認為：它揭示出真實的符號性，卻不顧及實在的堅固性；它不屑於與意識形態為伍，卻一頭栽倒進參與式民主的幻夢；它關懷實踐的人，卻從未觸碰到人的實踐；它傾慕理想的對話，卻迴避現實的衝突；它有神聖的宗教情結，卻並不垂眸向世俗；它在各個學術傳統中穿梭，卻把一個「通貨膨脹」的文化概念留給自己；它懷疑一切，卻不曾想自己也值得懷疑；它試圖維持平衡，卻終究徒勞無功。（周鴻雁，2012：370–397）

讓我們來小結一下吧：語言論構造了範式，也建起了藩籬。在替認識論轉向彌補過失的道路上，語言論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它系統性地將「走出二元」目的化、教條化了，由此限制了包括當代學術的想像力。於是，相對溫和的批評稱它是「語言烏托邦」（王一川，1994：50）或「語言的牢籠」（李澤厚，2021：19），而激烈批評者如金觀濤（2022：8）則乾脆稱它是「一場禁錮人思想的革命」。

四、重返實踐論

語言論範式固有其歷史的榮耀，亦有其當下的局限性。今天，隨着人文責任的加重和未來意識的覺醒，我們要追問的是：除語言外，

是否還存在更迫切、更重大、更根本的問題亟待探索？就傳播學而言，媒介研究應在多大程度上區別於語言遊戲，其思想成果又應以何種方式回饋社會、回饋於人？以及，一種面向未來的傳播學究竟應如何迭代自己、養成自己，在數字時代史詩級的革命浪潮中安身立命？

直截了當地說，傳播學的未來不在「走向語言論」，而在「重返實踐論」。放眼當下，對肖教授所堅持的那種語言論傳播學，我們並不樂觀。我們認為，為了從根本上走出理論困境，應考慮超越語言論範式，倡導一種返璞歸真的傳播實踐論。具體來說，是要在更為樸素的實踐哲學指引下，重置傳播的定義域，尋求傳播學的再次生長。——「沒有甚麼比一個好理論更實用」，作為傳播學奠基人的勒溫（Kurt Lewin）這廣為人知的金句，點明了理論與實踐的諧振關係：實踐是理論之源、實踐是理論旨歸。

傳播學本就有着自發的實踐傳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尊重人之差異性的研究方法，如文本分析、焦點小組討論、自我報告等；（2）關注人之能動性的研究立場，如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Robert K. Merton）對大眾媒體負功能的批評：受眾「與現實政治生活只有間接的聯繫，他只是閱讀、收聽和思考，卻以為這可以代替決斷和行動。」（Lazarsfeld & Merton, 1948, p. 169）

然而，在傳播學信息論範式成型後，關注實踐卻成為了一種觀念反抗。回歸實踐的最初嘗試發生在信息論範式內部，比如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面對貝雷爾森關於傳播學的唱衰，他早在1959年就設想：通過關注人的媒介使用（而非媒體的信息傳遞）來扶大廈之將傾（Katz, 1959）。然而，為此而生的使用與滿足理論，最終亦因其路徑依賴而鎩羽，成為一次對信息論範式的失敗救亡。（黃旦，2018）

在語言論轉向的影響下，傳播學語言論範式也曾沿多種路徑向實踐靠攏，最終匯入歐美學術界晚近發展出的「實踐轉向」。

作為一種學術趨勢，實踐轉向初現於20世紀70年代，成型於20世紀90年代，先後流行於社會學和科學技術社會學（STS）兩個領域。在社會學領域，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實踐感》（*Le Sens Pratique*）（1980）和吉登斯的《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2016）是其最厚重的成果；STS轉向實踐則最早可以上溯到1979年拉圖爾

（Bruno Latour）主持的一項實驗室民族誌，真正形成規模則遲至1992年安德魯．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主編的《作為實踐和文化的科學》（*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1992）出版。

然而，由於自認是語言論轉向的延伸，這一場所謂的實踐轉向並未能覺醒其內在的超越性。我們能夠清晰地看見：在這種語言論實踐轉向中，依然存在着「走出二元」的教條。

德國學者萊克維茨（Andreas Reckwitz）就持有此論，他將上述兩個領域轉向實踐取得的成果統稱為「實踐理論」，並指出：「它超越了三種流行的二元論：行動理論（個體主義）vs. 秩序理論（集體主義），唯物主義vs. 文化主義，以及情境導向的微觀理論vs. 結構導向的宏觀理論。」（萊克維茨、羅薩，2024：37）《當代理論的實踐轉向》（*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2010）的第一主編夏茲金（Theodore Schatzki）也曾在1999年對實踐理論作了語言論的建構主義闡釋：「實踐解釋與如下信念相關聯，即諸如知識、意義、人類活動、科學、權力、語言、社會機構和歷史變遷這類現象發生在實踐領域內，並且也是實踐領域的組成部分。」（夏茲金、塞蒂納、馮．薩維尼，2010：1）

就概念而言，「實踐」本應與希臘語中的praxis相對譯，根據其所指不同，在英語中常有「practice」、「action」和「doing」三種譯法，在德語中也有「Handeln」和「Handlung」的差別，在現代漢語中則可以是「實踐」、「行動」或「行為」。然而，晚近以來，執着於「走出二元」的社會理論卻特意把「行動」從實踐的完整涵義中剝離出來，激進地主張它是與「結構」成對出現的二元論之一項，是個體主義的表現（英格里斯、索普，2022；萊克維茨、羅薩，2024）。於是，一種了無生氣的實踐理念、一個只能用於理論分析的實踐概念就這樣被創造了出來。

如此「實踐轉向」在傳播學中的投射，便是一個已然失利的「庫爾德利計劃」，它本應為傳播學帶來更深的變革。受詹姆斯．凱瑞啟發，英國學者庫爾德利（Nick Couldry）曾立志發展出轉向實踐的媒介理論（庫爾德利，2016；Couldry, 2004）。在他看來，「如果要探究如何憑藉媒介生活，最佳的出發點就是把媒介當作實踐來思考」，「從潛力上看，這一路徑的結果是媒介研究的新範式」（庫爾德利，2014：39–41）。通過

思考日常媒介使用如何塑造社會結構，庫爾德利及其同事提出了「媒介儀式」、「深度媒介化」等理論。然而，有學者敏銳地發現，「詭異的是，這些研究的過程和結論依然缺乏實踐的接地性，表現出以實踐作為新概念的思想思辨特徵」(王潤澤，2022)。深究起來，庫爾德利理論之所以凌空蹈虛，不可不歸咎於語言論對實踐概念的操弄。

也許，這才是肖小穗教授所當憂心的實踐概念：「雖然有行動，但沒有動機；雖然有實踐，但不知道實踐些甚麼；雖然有交往，卻聽不見聲音。」(2025) 肖教授對數字交往論的批評，所謂「撇除了溝通、語言、符號、意義、訊息等，便等同於掏空了人類交往的實際內容」(肖小穗，2025)，其實恰是語言論傳播學的症候：雖然有溝通，卻不關心溝通者；雖然有語言，卻不追問其語用；雖然有符號，卻無所謂其創造；雖然有意義，卻只能引人注意；雖然有訊息，卻不能知行合一。

一種失掉了行動性的實踐論，無論是作為語言、知識、技術或媒介出場，都不過是事實上的結構論而已，難以尋獲其應有的接地性。因此，當我們今天致力於回到實踐論時，不得不先去拆除那種名義上的「實踐」轉向或曰「後實踐論」(Post-Practice Theory) 的藩籬。

回到本文的主題。我們之所以選擇「重返實踐論」的口號而非「實踐轉向」來主張變革，正是希望能突破語言論轉向的局限性，在更古典、更寬廣、更接地的「實踐哲學」中探索一種徹底的實踐論，以期重置傳播學的思想體系。

瞻顧人類思想史的遙遠過去，有助於我們走向未來。李澤厚在思考為何以及如何「走出語言」時，基於中國哲學給出了自己的意見：語言哲學正確地指出了語言大於個人，但卻忽視了「生存經驗大於語言」這一常識。理性 (reason, rationality) 由合理性 (reasonableness) 建立，合理性是「度」(measure) 的延伸，「度」首先產生在使用－製造工具過程中；所謂「走出語言」就意味着，回到比語言更根本的「生」——生命、生活、生存的傳統。(李澤厚，2021：15、17、19、77)

「實踐哲學」在思想史上有所具指。起初，它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和政治學的代稱，指向一種與靜思的形而上學相區別的踐行之學，其要旨是：(1) 實踐是人類所從事的非生產性的、倫理的「行

動」，與「理論」和「製作」相區別；(2) 實踐的目的是最高的善，或曰「至善」(to ariston)；(3) 實踐論隸屬於規範性的政治學。(亞里士多德，1992：3–4) 亞里士多德實踐論的核心概念是至善，它既涉及個人幸福 (eudaimonia)，也指向城邦的共同善 (koinon agathon)。(巴恩斯，2013：122–129) 在亞氏的觀念中，「人是政治動物」，個人的良善生活無法脫離城邦的良治，倫理德性需通過城邦的公共生活實現，而政治制度的設計又以促進公民德性為目標。由此可見，在倫理學的意義上，實踐是規範性的；在政治學的意義上，實踐是行動性的。

亞氏以後，霍布斯 (Thomas Hobbes)、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康德 (Immanuel Kant) 等思想巨擘都發展出了各自版本的實踐哲學，甚至還出現了黑格爾 (Georg Hegel) 版本的「思辨的實踐哲學」。

馬克思 (Karl Marx) 是繼亞里士多德之後，又一位以實踐論為使命的思想者，他的學說在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那裏直接被冠以「實踐哲學」之名。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為實踐哲學賦予了新的意涵，「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馬克思，2018：60)。人們常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對這一新實踐觀的最為淺白的概括：(1) 真理不是顛撲不破的客觀實在，也並非肖文所強調的主觀世界中的「觀念」、「理解」、「認知」，真理需要被檢驗以完成；(2) 檢驗真理的標準有且只有實踐，即「感性的人的活動」；(3) 實踐因其現實性而區別於抽象的人類心理活動。

哈貝馬斯的弟子霍耐特 (Axel Honneth) 曾直接點明，任何版本的實踐哲學所共有的思想貢獻，都是它們對社會理論的啟迪，比如康德之於韋伯、黑格爾之於馬克思 (霍耐特，2021：104)。這也表明，實踐哲學孕育出的社會理論即便再注重經驗，也總具有基本的規範色彩，這與實踐轉向後的形形色色的「理論展演」風大不相同。

相較於轉向語言論的後實踐論，以馬克思學說為代表的實踐論，顯然對實踐本身有着更完整、更透徹地理解。從根本上說，後實踐論關注的是話語及其變體的建構作用，而馬克思的實踐論則強調形塑話語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力量：(1) 實踐論認為實踐是客觀的、物質性的活動 (如生產、革命)，具有明確的階級性和歷史規律性；後實踐論則質

疑實踐論的普遍性。(2) 實踐論採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強調「實踐—認識—再實踐」的循環；後實踐論更傾向於結構主義的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在存在主義的意義上，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可以被恰當表述為一種人類學，而一種實踐的哲學人類學之所以發生，在海德格爾（2016：23）看來，是因為「人之成問題，不僅僅，也不首先在於我們對於『人是甚麼』這個問題沒有任何本質性的、產生實效的答案，它的極尖銳之處在於，我們從來都不知道應該如何對人進行追問」。正因如此，實踐轉向不是為着建設一座學科大廈，而應該是「超出那之外，表示一種核心、廣泛而本質的認識」（海德格爾，2016：21），亦即對人本身的關懷。他們的學說共同匯入了晚近哲學史上「回到人」的思想洪流，「人的本質及其活動，以及在這個活動中所追求的方向應該是甚麼的古老又時新的問題，再次作為反思的人的主要問題得到重新的確認」（Bernstein, 1971, p. 320），正因如此，它們共同成為一種新實踐論的理論資源。

當我們寄希望於「重返實踐論」時，是在表達這一信念：那種更悠久、更本原的實踐論，不僅能在一個全新且動盪的數字時代開啟之際重新點亮人類的認知，亦可醫治後實踐論及其背後的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哲學沉痾。

「重返實踐論」在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意味着我們要承認倫理與政治的優先性，追求人的幸福和最好的公共性；「重返實踐論」在馬克思的意義上，則意味着我們要先承認（人的）實踐的本體性——一方面，重視人，探究作為「感性的人的活動」的實踐（馬克思，2018：59）；另一方面，不同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把實踐看作生活（語言）的現實化（形式）（伽達默爾、杜特，2005），實踐論哲學堅定地賦予實踐以根本地位，包括語言在內，都是實踐的產物。實踐論的「實踐」，是人的實踐；而不是語言論所謂的那種「行動與言說的聯結」（萊克維茨、羅薩，2024：37）。

2010年，夏茲金帶着自我批評的勇氣，面向中國讀者將「實踐轉向」重述為「通過、或藉助於、或依據某些實踐概念來思考人類生活、特別是社會生活的機構與運轉」，也因此，人——實踐着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概念（包括作為概念的實踐），被他明顯強調了：「有充分理

由相信『實踐轉向』的持續思索與分析會轉向這種趨勢：少關注理論的範疇，多關注對特殊實踐現象的分析，即由『實踐理論』轉向『實踐分析』。」（夏茲金、塞蒂納、馮．薩維尼，2010：3）。

我們認同「走出語言」，期待復歸「生」的中國傳統，回到亞里士多德、馬克思式的實踐論，重返一種具有超越性的、徹底而全面的實踐主義，它將致力於探究「感性的人的活動」（實踐）。如前所述，重返實踐論也許意味着，我們有機會重置傳播的定義域、重置傳播學的根本命題，並以此尋求「傳播學」再度出發的可能性。

果能如此，我們也將回到曾被抹去的歷史原點，藉「實踐復興」之名，讓傳播學的思維與觀念超越信息、走出語言，融匯更為廣大、更為原生的實踐，致力於傳播學的再次養成——「重新走向養育過自己的場域，並與所有學科對話，就像一個疲憊的漫遊者最終回到故里，親近所有他認識的人」（杜駿飛，2024）。果能如此，我們也將有望看到一種新的人類交往之學，去關懷更為重要、更為日常、更為普遍的實踐，去「關懷實踐的人」，並「再一次論證終極關懷和人文世界的意義」。

我們認為，在這個「交流即行動，媒介即我們」（杜駿飛，2023：4）的數字時代，傳播研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理由融匯實踐，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理由重返實踐論——重返社會，重返人，以培養「人類交往」甚至「跨生命交往」（杜駿飛，2023：225）的理論。

五、實踐主義的交往論

曼海姆（Karl Mannheim）有言：「一個問題未成為現實問題之前，不會成為知性問題。」（2005：12）肖文聲言人類傳播本源於「內在的行為趨向和動力來源」，其「在線還是線下、虛擬還是實在、數字還是非數字，沒有根本性的區別」，這顯然是自蔽於「傳播實踐化」的新現實。

大概，一個當代學人無需穿越到未來，僅在今日水平的在線社交、混合現實（MR）、物聯網（IoT）、工業互聯網（II）、生成式人工智能（GAI）、腦機接口（BCI）、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非同質化通證（NFT）、去中心化金融（DeFi）之類應用中稍作體驗，答案便不言自明。

基於數字交往論，在絕大多數的數字生活場景中，交流－行動是最小分析單位。要知道，人類只有在這個時代才真正實現「交流即行動，媒介即我們」，既然如此，我們又怎能不基於當下「數字交往」的交流－行動特質，對「傳播」再概念化和再問題化？又怎能說新舊傳播、新舊傳播學沒有根本性的區別呢？

通常，我們在三重意義上使用「交往」(交流－行動)這一術語：(1)一種社會現實，在物質維度上通向身體哲學；(2)一種存在方式，在政治維度上通向行動哲學；(3)一種思想路徑，在倫理維度上通向社會哲學。

作為一種經驗概括，數字交往折射着當前人類傳播實踐的全景，它意味着，一個比特與原子、數據與物質、虛擬與實在相混合的數字世界已被建立，與此同時，人類的多維度精神與多維度的現實之間也正在交融。但是，如杜駿飛所強調，虛擬現實的本質是「現實虛擬」。數字交往的決定因素，仍然是社會與人，而非媒介與技術；「現實虛擬」的觀念意味着，虛擬中所蘊含的現實性決定了虛擬自身。「甚麼時候我們開始回歸『現實虛擬』，甚麼時候我們才會得到真正有價值的『虛擬現實』」，「舉凡人類在數字人類世中的自我迷失，將『人性』置於『交往性』的技術支配之下，也是因為人不能以具身、日常等『現實虛擬』性來觀照數字化生存」(杜駿飛，2024：192–193)。

作為一個學術命題，數字交往明確地指向實踐論和聯結主義，「在超越傳統傳播的數字化生存時代，社會交流的本質正穩定地向聯結(association)演進，同時，那種面向未來而又具有人文價值觀的傳播研究，也當聚焦這一方向」(杜駿飛，2023：43)。我們深信，「真正的科學『運動』是通過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發生的」(海德格爾，2014：11)，傳播學的範式革命，也不得不從改造傳播概念做起。

要言之，所謂重返實踐論，則是以古典實踐論旨趣的「交流－行動」取代信息論或語言論的「傳播」，這便是數字交往論的基本邏輯(杜駿飛，2023：30–33)。就此而言，肖文批評數字交往論不過是又一種還原論，這大概是找錯了靶子——首先，還原論並非一無是處，柏拉圖將現象世界還原為「理念」的摹本，笛卡爾通過「普遍數學」將物質還

原為幾何化的廣延實體，這些都並不是甚麼離奇的錯謬。其次，從哲學史來看，實踐論恰恰最不可能混同為還原論。實踐論則主張從人的現實活動出發理解世界，反對將抽象理性凌駕於實踐之上：亞里士多德區分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強調倫理學、政治學的實踐導向；馬克思提出「實踐轉向」，將思維與存在的統一置於人類改造世界的活動中。如此主張的實踐論又怎麼可能會被標籤為還原論呢？

順便，我們還不得不澄清肖文中的另一個命題：「拉圖爾志在利用這一還原主義概念來去除一切有關『社會』和『社會的』的標籤（肖小穗，2025：217）」，肖文是要以此批評杜文與拉圖爾哲學的背離。這裏，且不說學習前人便需與之一致是一個典型的邏輯陷阱，僅以肖文給拉圖爾貼的標籤來說，便是貼錯了。

哲學界一般認為，拉圖爾的理論並非還原主義，而是以「非還原性原則」為基礎的非人類中心主義（non-anthropocentrism）：（1）拉圖爾反對二元對立，拒絕將自然與社會、主體與客體割裂，主張所有行動者在網絡中具有平等地位；（2）拉圖爾的「動態網絡優先」說是要關注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性而非還原性，其「實在的梯度」（gradients of resistance），也是在強調事物的實在性源於其在網絡中抵抗或改變其他行動者的能力，而非獨立於網絡的本質屬性；（3）拉圖爾所提出的轉譯的複雜性，更是指行動者通過轉譯將其他行動者的利益轉化為自身行動的「語言」，這一過程無法被簡化為單一因素（如經濟利益或文化結構）的還原。（劉鵬，2014；洪曉楠、鍾曉林，2014）就以上哲學理解而言，拉圖爾恰是更真誠的非還原主義。拉圖爾自己也說得很清楚，「行動者網絡理論並不是荒唐地在人和非人之間建立某種對稱。對我們來說，要做到對稱僅僅意味着不在人類有意識的行為和充滿因果性關係的物質世界之間強加某種先在的虛假的非對稱性」（Latour, 2007, p. 76）。

我們認為，拉圖爾的本意當是回歸「社會」的原初意涵（即聯結行動者），在去中心化的網絡中，將人類與非人類行動者共同納入分析框架，探索社會技術雜合體的湧現過程。這樣的理論旨趣不僅是反還原主義的，甚至，在更高維度上還是屬於生命哲學的。這才是數字交往論借鑑拉圖爾學說的緣由。更不消說，拉圖爾後期思想具有顯著的人文關懷，尤其體現在其生態階級論與蓋婭理論——眾所周知，他提出

「蓋婭」(Gaia) 概念，就是要將地球視為人類與非人類共同參與的巨型行動者網絡，強調生態危機的根源在於人類對非人類行動者的忽視，而這一洞見，正是杜文中「普遍聯結」、「生命團結」之所宗，不是嗎？更有甚者，拉圖爾提出棲居於大地的倫理——主張人類需以「合成秩序」(synthetic order) 替代「現代性」的征服邏輯，通過協商與非人類行動者共存，實現「在大地上詩意棲居」。試問，這樣的拉圖爾，怎會被目為還原主義者呢？這樣的交往概念，怎會被「還原為」還原主義概念呢？我們以為，貼標籤不是一種好的辯論，而肖文此處的標籤則更是一種不該有的哲學誤解。

肖文又問，人類的交往 (association) 是否「僅限於結交、集結、聚合等行動」?「一群不在乎溝通也不在乎彼此感受和理解的人，為甚麼還要尋求交往 (結交、集結、聚合)？他們又憑甚麼可以交往和行動在一起？再說，排除了交往中的相互溝通和理解，也就抽空了人類交往的神髓——這可是人類交往中最有意義、最靈動、也最核心的部分。」(肖小穗，2025：216)

我們猜測，肖文大概是錯會了杜文所論「交往」的意義。對於舊有的傳播論而言，「交往」不是「僅限於」結交、集結、聚合，而恰恰是「上升到」了結交、集結、聚合——更準確的抽繹，其實應該是「上升到」了「團結」(一個在〈數字交往的觀念〉一文中被十四次提到的觀念)。如果說「數字交往的理論關懷，是要建立數字社會的普遍聯結，一種『蓋婭』(Gaia) 尺度上的生命團結」(杜駿飛，2024)；那麼，有甚麼理由說它「僅限於」結交、集結、聚合呢？比之於信息論範式的傳播學，不應該說它抵達了「人類交往中最有意義」部分嗎？又有甚麼理由說它排除了「相互溝通和理解」呢？既然，數字交往已經言明其所要致力的是「對行動、認知的理解，對互利和團結的認同」(杜駿飛，2024)，那麼，比之於語言論範式的傳播學，不應該說它正在努力呈現「人類交往的神髓」嗎？又有甚麼理由說它「不在乎溝通也不在乎彼此感受和理解」呢？這還真是有點令人費解。

我們以為，有必要重申，聯結是實踐中的聯結，是 (人的) 具體的、整體的「交流－行動」，而非勾連起「交流」與「行動」的符碼「－」；有必要重申，傳播不只是對話，更是人的全息行為；有必要重申，實

踐論的聯結主義不是在抽空或取消，而是要以交往實踐去迭代語言傳播，將人的理解確立在物質、而非闡釋的堅實基礎上。

我們以為，是時候承認如下事實了：人類的一切交流都是依賴語境的——交流的分量越重，對語境的依賴程度越高——它表現為信息和符號，但又遠非信息符號所能規定；它受語言和象徵約束，但又遠非語言象徵所能建立。想想吧，微信交流遠非手機上的文字往返，電影傳播遠非影院裏的音視頻輸出－輸入，人機互動遠非數據集的生成對話，平台世界也遠非算法邏輯 + 大數據分析——如此等等，要想真正還原一種交流的本質，就必須對應到「交往端」的人和社會，對應到交流所涉的事件、目的、背景，對應到交流之中的情感、關係與身份。

「傳播」之道可道，但它並非尋常的傳播之道。人類的「交流」行為可以被認知，但它並非低維度的交流。說得明白一點，若非實踐論意義上的「交往」，則非本質的、基礎的、整體的「傳播」或「交流」。我們認為，區別這二者的意義，攸關傳播學能否實現觀念躍遷。而這一躍遷至關重要——對於傳播學的變革而言，它既是知識論，也是認識論，更為關鍵的是，它最終通向真正的本體論。[2]

人工智能專家李飛飛在分析人工智能問題時指出，語言是純粹生成性的，是一維的，而現實世界卻是三維甚至是四維的，「沒有空間的通用人工智能是不完整的」（量子位，2025）。——與此同理，關於傳播學的實踐論，我們亦有如下命題：「傳播學」的真正本體，不是語言論意義上的「傳播」，當然更不是「媒介」，而只能是社會與人的實踐本身。

據此，如果我們將指涉交流－行動的實踐稱之為「交往」，那麼，經典的「傳播」或「交流」就是交往在低維世界的投影。如果我們將重返實踐論的傳播學稱之為「交往研究」，那麼，執着於符號、信息、媒介等表徵的傳播學也就是「交往研究」在不同片面上的投影——這也恰是非表徵傳播（non-representational communication）研究在最近的二十年間能夠興起的主因。進一步地說，即便投影式的傳播研究足夠精巧，那種將投影當作本體的學科觀念也必定是一種刻意的誤導。

就此而言，作為實踐的「交往研究」並非是語言論的「傳播研究」的替代，而是後者的超集（superset），[3]亦即包含經典傳播研究集合的集合。肖文認為「語言溝通、符號互動作為人類交往的基本形式，不會因

為外部技術條件和媒介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根本性改變。的確如此，人類本性不變，語言符號亦不至於大變，但問題在於，實踐論意義上的人類交往並非止於語言符號，一如冰山不止於其海面部分——基於這一隱喻，我們的意見是，假如傳播學真的是對冰山本身（而不是只對海面奇觀）有興趣，那麼，必不至於反對傳播學回到整體、系統、升維的實踐論。

我們意識到，越是在一個高度虛擬化的數字交往時代，越是要有徹底的實踐精神，因此，傳播學發展的曙光，應該是一種關懷人與社會本體的、堅實可靠的實踐論，而不是喧囂無盡的技術決定論、故步自封的媒介中心論、浮光掠影的語言文化論。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對於真正的實踐主義而言，物質性也只是一個認識論入口，而不是學術的本體性歸宿。「經典的」傳播學者總是更執着於媒介，更像是語言的忠粉，而不是關懷人類生存本體的人。而我們堅持認為，交往是媒介、信息、符號的，也是人與社會的，而歸根結底，它是人與社會的。只有審辨清楚人與社會的交往本性，才能與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那樣的物質性邏輯及其背後的媒介中心論（更深一層，則是思想史上的語言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劃清界限。

值得高興的是，肖文也認為「我看不出一個泛化和籠統的社會實踐概念能帶來甚麼希望，我倒是認為只有堅持社會實踐的主體性、在地性、反思性和批判性才是我們未來數字生存之本。」（肖小穗，2025：229）我們認為，正是在這裏，肖教授與我們所呼喚的實踐論是一致的。數字交往的實踐論，一方面是要回到亞里士多德，將實踐的核心重新校準到數字時代的「良善生活」；另一方面，它也應回到馬克思，將媒介化實踐定義為人類改造自然和社會的物質活動，強調實踐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也受歷史條件制約。

另一個與此相關的話題，是肖教授也同樣關心的「何以為人」之問。在數字交往的論域中，「何以為人」的思想關切（杜駿飛，2023：222–226），指向一種新人類主義或新人文主義（neo-humanism）。作為一種哲學、倫理學和文化理論思潮，新人類主義旨在回應現代性危機（如技術異化、新物質主義、生態危機等），同時超越傳統人文主義的局限性，主張在科學技術發展背景下重新審視人類的本質、價值與責

任，強調技術倫理、生態智慧、全球共同體意識，並試圖調和理性與感性、個體與群體、人類與非人類的關係。

就此而言，我們不同意肖教授的意見——面對數字交往的社會現實，「人該幹嘛還幹嘛」（肖小穗，2025）。我們認為，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應該是：在新人文主義的基礎上重建數字時代人的尊嚴。

從新人類主義或新人文主義的意義上來說，數字交往的實踐論意味着，研究虛擬的目的，其實是要致力於在數字化時代塑造現實；研究媒介的目的，其實是要致力於在媒介化時代擴展人；研究傳播的目的，其實是要在更高的維度上還原人類社會「交往」水平。我們意識到，唯有如此，「數字交往的實踐轉向才具有範式轉變的可能」，也唯有如此，才能「讓傳播理論跟上且超越人類傳播技術的步伐」，「最終讓社會哲學也能在傳播研究中獲得抽象而富有意義的啟迪」（杜駿飛，2023：44）。

今天，我們所有人都已經看到，面對數字交往實踐重塑社會、改造人類的現實，一批積極回應時代之問的人文思想正競相湧現。例如：金觀濤（2022）的「真實性哲學」致力於重建因現代性狂飆突進而失落的人類真實心靈；孫周興（2023）的「未來哲學」主張以技術與人類未來、新生命經驗重建、保衛個體自由為基本關切；吳冠軍則着意推動政治學的「量子轉向」，其宏旨「不是去預測世界變化的前景，而是聚焦改變世界的諸種可能性」（2023：404）。

這些充滿生機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彷彿在昭示：一個新的學術變革時期即將來臨。同時，這些新思想的湧現也在鼓勵我們，在傳播研究的疆域裏，新一代學人應有志於以未來迭代傳統，破舊立新，變法圖存。而就本題而言，我們堅定地相信，傳播學的思想巨輪應重返實踐論，而實踐主義的「交往研究」也將有助於傳播學重新發現理論。

註釋

1　索卡爾事件發生於1996年，美國物理學家索卡爾（Alan Sokal）向文化研究雜誌《社會文本》（*Social Text*）提交了一篇題為〈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的詐文。文章故意堆砌科學術語與邏輯謬誤，卻因符

合後現代主義對科學的「解構」範式而被編輯接受發表。隨後索卡爾公開揭露真相，引發全球科學與人文領域的激烈論戰。

2 所謂「本體」或本體論，作為一種修辭，可以指對任一事物的質的追問，因而，語言有語言的本體論（如伽達默爾），媒介有媒介的本體論（如基特勒），人則自成其本體論。這其實是在認識論層面探討本體問題。我們選擇在海德格爾存在論的意義上使用「本體」一詞，並認為其表現出對本體修辭的超越性。亦即，存在即終極意義上的本體。在海德格爾看來，「存在問題和對這一問題的展開恰恰以此在為前提，就是說，以人的本質規定為前提」，「確切地說，存在的開放需要人，反過來，只有人處於存在的開放中，人才是人」（奈斯克、克特琳，2005：6）。易言之，存在主義的本體論事實上就是主體論，離開具有主體性的人，也就無本體可論。

3 這裏借用了一個數學集合論的術語。子集（subset）和超集描述的是集合之間的包含關係，若集合B包含集合A的所有元素，且可能包含額外元素，則稱B是A的超集，記作$B \supseteq A$（或$A \subseteq B$）。需要說明的是，超集並非全集（universal set），全集是特定上下文中所有可能元素的集合，顯然，即便是升維的傳播研究，也不應有全集的自許，更何況局限在表徵維度的傳播學。

披露聲明

本文作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s.

研究經費資助

本文獲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數字交往時代傳播學基礎理論研究」（24ZD007）經費資助。

Funding

This article wa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Jiangsu Provincial Social Science Fund (24ZD007).

ORCID

張晨昊（Chenhao ZHANG）https://orcid.org/0009-0007-0633-5847
杜駿飛（Junfei DU）https://orcid.org/0000-0001-5674-0364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Chinese Section）

大衛．英格里斯、克里斯托弗．索普（2022）。《社會理論的邀請》（何蓉、劉洋譯）。商務印書館。（原書Inglis, D., & Thorpe, C. [2012].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theory*. Polity Press.）

Inglis, D., & Thorpe, C. (2022).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theory* (R. He & Y. Liu, Trans.).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2)

于成（2022）。《媒介觀念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Yu, C. (2022).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medi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王一川（1994）。《語言烏托邦 —— 20世紀西方語言論美學探究》。雲南人民出版社。

Wang, Y. (1994). *Language utopia: An inquiry into western linguistic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王一川（編）（2009）。《西方文論史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

Wang, Y. (Ed.). (2009). *A cours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王潤澤（2022）。〈實踐轉向與元問題聚焦：對新聞學知識體系創新的思考〉。《新聞記者》，第2期，頁14–19。

Wang, R. (2022). The practical turn and focus on meta-problems: Reflections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journalism knowledge system. *Journalism Review*, *2*, 14–19.

丹尼爾．傑．切特羅姆（1991）。《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曹靜生、黃艾禾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原書Czitrom, D. J. [1982].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zitrom, D. J. (1991).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J. Cao & A. Huang, Trans.).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2)

卡爾．馬克思（2018）。〈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恩格斯（著），《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頁59–62）。人民出版社。（原書Marx, K. [1888]. Thesen über Feuerbach. In F.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pp. 59–62). Verlag von J. H. W. Dietz.）

Marx, K. (2018). Thesen über Feuerbach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Trans.). In F.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pp. 59–62).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8)

尼克．庫爾德利（2014）。《媒介、社會與世界：社會理論與數字媒介實踐》（何道寬譯）。 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Couldry, N. [2012].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Polity Press.）

Couldry, N. (2014).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D. He, Trans.). Fuda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2)

尼克．庫爾德利（2016）。《媒介儀式：一種批判的視角》（崔璽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Couldry, N. [2002].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Routledge.）

Couldry, N. (2016).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X. Cui, Trans.).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2)

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2019）。《實體之夜：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論文選輯》（李雙志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Kittler, F. A. (2019). *The night of the substance: Selected essays by Friedrich Kittler* (S. Li, Tran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西奧多．夏茲金、卡琳．諾爾．塞蒂納、埃克．馮．薩維尼（編）（2010）。《當代理論的實踐轉向》（柯文、石誠譯）。蘇州大學出版社。（原書Schatzki, T. R., Cetina, K. K., & von Savigny, E. [2000].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Routledge.）

Schatzki, T. R., Cetina, K. K., & von Savigny, E. (Eds.). (2010).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W. Ke & C. Shi, Trans.).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0)

托馬斯．庫恩（2022）。《科學革命的結構》（張卜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hn, T. S. (202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B. Zhang, Tran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0)

安東尼．吉登斯（2016）。《社會的構成》（李康、李猛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olity Press.）

Giddens, A. (2016).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K. Li & M. Li, Trans.).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4)

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哈特穆特．羅薩（2024）。《晚期現代社會的危機：社會理論能做甚麼？》（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Reckwitz, A., & Rosa, H. [2021]. *Spatmoderne in der Krise: Was Ieistet die Gesellschaftstheorie*. Suhrkamp.）

Reckwitz, A., & Rosa, H. (2024). *Spatmoderne in der Krise: Was Ieistet die Gesellschaftstheorie* (Z. Zheng, Trans.).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21)

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2005）。《麥克盧漢與虛擬實在》（劉千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Horrocks, C. [2000]. *Marshall McLuhan and virtuality*. Icon Books Ltd.）

Horrocks, C. (2005). Marshall McLuhan and virtuality (Q. Liu, Tran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0)

克里斯蒂娜．娜豐（2019）。《解釋學哲學中的語言學轉向》（何松旭、朱海斌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原書Lafont, C. [2002].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 The MIT Press.）

Lafont, C. (2019).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 (S. He & H. Zhu, Trans.).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2)

杜駿飛（2002）。《瀰漫的傳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Du, J. (2002). *Diffusion of communic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杜駿飛、周玉黍（2014）。〈傳播學的解放〉。《新聞記者》，第 9 期，頁 33–39。

Du, J., & Zhou, Y. (2014). The emancip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Journalism Review*, *9*, 33–39.

杜駿飛（2023）。《數字交往論》。江蘇人民出版社。

Du, J. (2023). *Digital association theor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杜駿飛（2024）。〈數字交往的觀念〉。《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9 期，頁 179–210。

Du, J. (2024). Digital association: Conceptual elabo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9*, 179–210.

李金銓（2019）。《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Lee, C. C. (2019). *Crisscross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istorical context and glob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李耘耕、胡翼青（2015）。〈導讀：傳播研究的星空〉。胡翼青（編），《西方傳播學術史手冊》（頁 1–16）。北京大學出版社。

Li, Y., & Hu, Y. (2015). Introduction: The starry sk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Y. Hu (E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pp. 1–16).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李澤厚（2021）。《中國哲學如何登場：與劉緒源對談》。南京大學出版社。

Li, Z. (2021). *How Chinese philosophy makes its entrance: A dialogue with Liu Xuyuan*.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肖小穗（2025）。〈數字交往還是符號互動？兼與杜駿飛教授商榷〉。《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71 期，頁 211–243。

Xiao, X. (2025). Digital association or symbolic interaction? A discussion with Prof. Du Junfei.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1*, 211–243.

吳志遠、杜駿飛（2016）。〈海德格爾技術哲學對新媒介研究的現實意義〉。《當代傳播》，第 6 期，頁 78–80。

Wu, Z., & Du, J. (2016).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or new media research.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6*, 78–80.

吳冠軍（2023）。《從元宇宙到量子現實：邁向後人類主義政治本體論》。中信出版社。

Wu, G. (2023). *From metaverses to quantum realities: Towards a post-humanist political ontology*. CITIC Press Group.

汪堯翀（2023）。《居間美學：當代美學轉型的另一種可能》。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Wang, Y. (2023). *Intermediary aesthetics: Another possibil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阿克塞爾．霍耐特（2021）。《我們中的我：承認理論研究》（張曦、孫逸凡譯）。譯林出版社。（原書 Honneth, A. [2010]. *Das Ich im Wir: Studien zur Anerkennungstheorie*. Suhrkamp Verlag.）

Honneth, A. (2021). *Das Ich im Wir: Studien zur Anerkennungstheorie* (X. Zhang & Y. Sun, Trans.). Yili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0)

亞里士多德（1992）。《尼各馬科倫理學》（苗力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Aristotle. [1934]. *Nicomachean ethics* (H. Rackham,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ristotle. (1992). *Nicomachean ethics* (L. Miao, Trans.).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4)

拉瑞．勞丹（1990）。《進步及其問題：一種新的科學增長論》（劉新民譯）。華夏出版社。（原書Laudan, L. [1978].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udan, L. (1990).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 (X. Liu, Trans.).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8)

金觀濤（2022）。《消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困境》。中信出版社。

Jin, G. (2022). *Vanishing reality: The intellectual predicament of modern society*. CITIC Press Group.

周好雨、胡翼青（2023）。〈狂飆突進的10年：中國媒介理論研究的嬗變〉。《傳媒觀察》，第2期，頁5–14。

Zhou, H., & Hu, Y. (2023). A decade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advance of media theory in China. *Media Observer*, *2*, 5–14.

周鴻雁（2012）。《隱藏的維度：詹姆斯．W．凱瑞儀式傳播思想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Zhou, H. (2012). *The hidden dimension: A study on James W. Carey's thought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胡翼青（2007）。〈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神話的背後〉。《國際新聞界》，第4期，頁5–8。

Hu, Y. (2007). Behind the myth of the four founder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4*, 5–8.

胡翼青（2016）。〈重新發現傳播學——從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談起〉。《國際新聞界》，第2期，頁170–173。

Hu, Y. (2016). Rediscovering communication studies: Starting from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2*, 170–173.

胡翼青（2022）。〈傳播研究版圖的三國演義〉。《當代傳播》，第2期，頁1。

Hu, Y. (2022).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andscape: A parallel to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2*, 1.

威廉．弗盧塞爾（2022）。《傳播學：歷史、理論與哲學》（周海寧譯）。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Flusser, V. [1998]. *Kommunikologi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lusser, V. (2022). *Kommunikologie* (H. Zhou, Trans.). Fuda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8)

祝建華（2012）。〈序言：1990年代那些平凡而又難忘的故事〉。《20世紀90年代西方大眾傳播學研究》（廖聖清著）。復旦大學出版社。

Zhu, J. (2012). Foreword: Those ordinary yet unforgettable stories of the 1990s. In S. Liao, *Wester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1990s*. Fudan University Press.

洪曉楠、鍾曉林(2014)。〈拉圖爾的行動本體論評析〉。《自然辯證法研究》，第7期，頁28–32。

Hong, X., & Zhong, X. (2014). Study on Latour's ontology-in-action.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7*, 28–32.

洪謙(2022)。《維也納學派哲學》。北京出版社。

Hong, Q. (2022). *The philosophy of the Vienna Circle*. Beijing Press.

約翰．杜海姆．彼得斯(2020)。《奇雲：媒介即存有》(鄧建國譯)。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Peters, J. D.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ters, J. D. (2020).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J. Deng, Trans.). Fuda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5)

貢特．奈斯克、埃米爾．克特琳(編)(2005)。《回答——馬丁．海德格爾說話了》(陳春文譯)。江蘇教育出版社。(原書Neske, G., & Kettering, E. [1988]. *Antwort—Martin Heidegger im Gesprach*. Klett-Cotta.)

Neske, G., & Kettering, E. (Eds.). (2005). *Antwort—Martin Heidegger im Gesprach* (C. Chen, Trans.).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8)

埃弗里特．M．羅傑斯(2012)。《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殷曉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原書Rogers, E. M. [1994].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The Free Press.)

Rogers, E. M. (2012).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X. Yin, Trans.).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4)

格蘭．G．斯帕克斯(2013)。《媒介效果研究概論》(何朝陽、王希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Sparks, G. [2012]. *Media effects research: A basic overview*. Wadsworth Publishing.)

Sparks, G. (2013). *Media effects research: A basic overview* (Z. He & X. Wang, Trans.).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2)

馬丁．海德格爾(2014)。《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Heidegger, M. [1927]. *Sein und Zeit*. Max Niemeyer Verlag.)

Heidegger, M. (2014). *Sein und Zeit* (J. Chen & Q. Wang, Trans.).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馬丁．海德格爾（2016）。《德國觀念論與當前哲學的困境》（莊振華、李華譯）。西北大學出版社。（原書Heidegger, M. [1997]. *Der Deutsche Idealismus [Fichte, Schelling, Hegel] und die Philosophische Problemlage der Gegenwart*. Vittorio Klostermann.）

Heidegger, M. (2016). *Der Deutsche Idealismus [Fichte, Schelling, Hegel] und die Philosophische Problemlage der Gegenwart* (Z. Zhuang & H. Li, Trans.).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7)

馬里奧．邦格（2024）。〈哲學與社會學的聯繫〉（董傑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Bunge, M. [1999]. *The sociology-philosophy connection*. Routledge.）

Bunge, M. (2024). *The sociology-philosophy connection* (J. Dong, Trans.).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9)

馬歇爾．麥克盧漢（2023）。〈人與媒介（1979）〉（何道寬譯）。斯蒂芬妮．麥克盧漢、戴維．斯坦斯（編），《麥克盧漢如是說》（頁 266–284）。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原書McLuhan, M. [2003]. Man and media (1979). In S. McLuhan & D. Staines (Eds.), *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 [pp. 266–285]. McClelland & Stewart.）

McLuhan, M. (2023). Man and media (1979). (D. He, Trans.). In S. McLuhan & D. Staines (Eds.), *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 (pp. 266–285).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3)

恩斯特．卡西爾（2013）。《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原書Cassirer, E. [1962]. *An essay on m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assirer, E. (2013). *An essay on man* (Y. Gan, Trans.).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2)

特里．伊格爾頓（2021）。《理論之後》（商正譯）。商務印書館。（原書Eagleton, T. [2004]. *After theory*. Basic Books.）

Eagleton, T. (2021). After theory (Z. Shang, Trans.).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4).

徐友漁（1994）。《「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學中的語言論轉向》。上海三聯書店。

Xu, Y. (1994).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The linguistic turn in philosophy*.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孫周興（2023）。《積極生活的理由：一種未來哲學的追問》。浙江教育出版社。

Sun, Z. (2023). *Reasons for an active life: An inquiry into a future philosophy*.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曼海姆（2005）。《卡爾．曼海姆精粹》（徐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

Mannheim, K. (2005). *The essence of Karl Mannheim* (B. Xu, Trans.).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張國良（2003）。〈早川〉。張國良（編），《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頁247–248）。復旦大學出版社。

Zhang, G. (2003). Hayakawa. In G. Zhang (Ed.), *Classic text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 the 20th century* (pp. 247–248). Fudan University Press.

強以華（2018）。《西方哲學普遍性的衰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Qiang, Y. (2018). *The fall of universalit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黃旦（2018）。〈新聞傳播學科化歷程：媒介史角度〉。《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0期，頁60–81。

Huang, D. (2018). The disciplinz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 media histo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10*, 60–81.

黃旦（2024）。〈傳播研究範式的變更：媒介學的興起〉。《傳播與社會學刊》，第70期，頁153–184。

Huang, D. (2024). Paradigm shift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ise of mediology.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0*, 153–184.

量子位（2025年7月2日）。〈李飛飛最新訪談：沒有空間智能，AGI就不完整〉。上網日期：2025年8月10日，取自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9--aj0bvhLmfMGaBlZOgpA。

Liangzi wei (2025, July 2). *Li Fei-Fei's latest interview: Without spatial intelligence, AGI is incomplet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https://mp.weixin.qq.com/s/9--aj0bvhLmfMGaBlZOgpA

喬納森．巴恩斯（2013）。《亞里士多德的世界》（史正永、韓守利譯）。譯林出版社。（原書Barnes, J. [2001]. *Aristotl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nes, J. (2013). *Aristotl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Z. Shi & S. Han, Trans.). Yili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1)

詹姆斯．W．凱瑞（2019）。《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丁未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Carey, J. W. [1992].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Routledge.）

Carey, J. W. (201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W. Ding, Trans.).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卡斯滕．杜特（2005）。《解釋學、美學、實踐哲學：伽達默爾與杜特對談錄》（金惠敏譯）。商務印書館。（原書Gadamer, H., & Dutt, C. [2000]. *Hermeneutik·Asthetik·Praktische philosophie: Hans-Georg Gadamer im Gesprach*. Universitatsverlag Winter Heidelberg.）

Gadamer, H., & Dutt, C. (2005). *Hermeneutik·Asthetik·Praktische philosophie: Hans-Georg Gadamer im Gesprach* (H. Jin, Trans.).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0)

劉海龍（2020）。〈作為知識的傳播：傳播研究的知識之維芻議〉。《現代出版》，第4期，頁23–31。

Liu, H. (2020). Communication as knowledg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knowledge dimens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odern Publishing*, *4*, 23–31.

劉海龍（2024）。〈序言：閱讀弗盧塞爾的姿態〉。《姿態：一種現象學實踐》（威廉．弗盧塞爾著；錢婕、周海寧譯）。復旦大學出版社。

Liu, H. (2024). Preface: On the Flusser's theory of Gesten. In V. Flusser, *Gesten: Versuch einer Phanomenologie* (J. Qian & H. Zhou, Trans.). Fudan University Press.

劉鵬（2014）。〈現代性的本體論審視——拉圖爾「非現代性」哲學的理論架構〉。《南京社會科學》，第6期，頁44–50。

Liu, P. (2014). On modernity from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Latour's philosophy of "nonmodernity."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6*, 44–50.

霍華德．S．貝克爾（2017）。《社會學家的竅門：當你做研究時你應該想些甚麼？》（陳振鐸譯）。重慶大學出版社。（原書Becker, H. [1998].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cker, H. (2017).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Z. Chen, Trans.).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8)

蘭斯．斯特拉特（2016）。《麥克盧漢與媒介生態學》（胡菊蘭譯）。河南大學出版社。

Strate, L. (2016). *McLuhan and media ecology* (J. Hu, Trans.). Henan University Press.

英文部分（English Section）

Berelson, B. (1959).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1), 1–6.

Bernstein, R. J. (1971). *Praxis and acti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ies of human activ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ourdieu, P. (1980). *Le Sens Pratique*. Editions de Minuit.

Cobley, P. (2010).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Routledge.

Couldry, N. (2004).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 *14*(2), 115–132.

Craig, R. T. (1999).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Communication Theory*, *9*(2), 119–161.

Fiske, J. (1990).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Routledge.

Grossberg, L. (2006). Does cultural studies have futures? Should it? (Or what's the matter with New York?). *Cultural Studies*, *20*(1), 1–32.

Hall, S. (1992).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277–294), Routledge.

Katz, E. (1959).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Studies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2*, 1–6.

Latour, B. (2007).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zarsfeld, P. F., & Merton, R. K. (1948).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L.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pp. 95–118). 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Signet.

McLuhan, M. (2006). *The classical trivium: The place of Thomas Nashe in the learning of his time*. Gingko Press.

Peters, J. D. (1986).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4), 527–559.

Pickering, A. (Ed.). (1992).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rty, R. (1967).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ramm, W., & Porter, W. E. (1982). *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 Pearson Education.

Wittgenstein, L. (1963).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Suhrkamp Verlag.